

得真好。他配的旁白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艺术品来欣赏。我在单位里也没有刻意地拜他们为老师，但我经常在棚里面看他们怎么配音。这是难得的学习的机会。

邱岳峰老师我说实话只是很尊敬他，我偶尔也会向他请教，私交谈不上。毕克老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，我们几乎每周要去两次。他当时住在瑞金医院的干部病房，他的肺气肿发展到肺衰竭的程度。之前，他到冬天会去医院调养一个月的时间，但那一次，他再也没有走出来。我太太也非常崇拜毕克老师，但从来没见过他本人，他生病以后，我太太有时会烧点菜给他带去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算有了更多的私下交往的机会。毕克老师病重时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拿个小黑板，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：“你是一个好人。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们的配音是一遍过，还是说会沟通和排练？

童自荣：符合导演的要求，一遍过是最好的，这一遍，你的感情一定是特别饱满，特别新鲜。但是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总要录好几次。现场的执行导演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，不能过，就得再来。尤其是一些台词多、语速快的戏，情绪要求又比较高的，一遍吃不下来，需要调整一下，第二、第三遍才行。

像邱岳峰、毕克这样的大师，他们也是要用功的，他们也不是一遍就过的。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。比如著名的英国电影《简爱》，简要走了，罗切斯特觉得他要永远失

去她了，于是叫她：“简！简！简！简！简！”连说了五个“简”。就这五个“简”，邱岳峰录了五遍都通不过。因为这部电影比较经典，是重点片，所以现场执行导演就是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，他要求很高。邱岳峰也累了，喝了一口汤，说“再来”。说到第六遍，终于过了。我们问老厂长，这遍怎么就过了呢？他说：“有一种揪心的疼。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有一种所谓的“上译翻译腔”，和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很不同，这种“上译翻译腔”是怎么形成的？

童自荣：其实我们是很反对所谓的“腔调”的，有“腔调”，那就雷同了。这是要克服的。我们塑造角色，每个角色都要有区别。绝对不能这个角色、那个角色，配的都一样。那就不符合要求了。关键还是你的理解对不对，你的表达对不对。“腔调”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

长春电影译制片厂配苏联、朝鲜的电影特别合适，不过他们的配音多少带一点东北话的腔调。一听就能听出来。

我们上译厂成立于1957年，

1957年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。解放初，翻译片组开始译制片配音时，配音演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北方，邱岳峰、赵慎之，天津人；李梓、于鼎，北京人；毕克、尚华，山东人。北方人有一个好处，用这样的配音演员，语言上不用把关了。和他们相比，我作为一个上海人，我很清楚自己和前辈之间的差距，只是观众可能听不出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们黄金一代的配音演员之后，配音的人才好像断代了，你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？

童自荣：我们老厂长一去世，我们厂的情况就一落千丈。应该讲，陈叙一做的台词本是最出色的。做台词本，不仅需要精通英语，中文表达也要是一流的，中英文水平不够，台词本就达不到要求。再加上导演的功力，所有人配好之后，需要导演来把关，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错了，可以了，但是他还能挑出不少问题。

此外，当时我们的配音阵容，就像戏曲里那样，生旦净末丑，都有，都全。邱岳峰、毕克、李梓，就这三位，毕克，正面角色，邱岳峰，反派，

李梓，女主角，就可以撑起一台戏。像老厂长这样的人不在了，要把翻译片搞得像样一些，谈何容易。再加上现在和从前的情况不一样了，七八十年代的观众氛围不存在了，当时观众把观看翻译片作为生活中很大的娱乐活动。现在不一样了。像我们这些上译厂的老人，总有一种不甘心，想要振兴，但很难。

下图：上译厂部分老中青同仁合影，摄于2013年。

